

大同北魏遗迹与《水经注》

□ 丰 驰

平城位于大同市城区和南郊，是北魏早期的都城。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次年(399年)迁都于汉平城，天赐三年(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都城经历了道武帝初创，元明帝、太武帝改扩建，孝文帝臻于完善，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结束了平城作为都城的历史，“孝昌之际，离乱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平城被烧为灰烬。此后的隋唐、辽金、明清，在平城故址上屡有兴建，连续重叠式的城市建设，致使北魏平城大多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平城昔日的辉煌只能从《水经注》精彩的描述中去领略。

《水经注》为北魏酈道元著，四十卷，今本乃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此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据《唐六典·工部·水部员外郎注》称，记载大小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一一穷源竟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的山陵、原湿、城邑、关津等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公元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地理著作。引用书籍多至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所引书籍和碑刻今多不传，文笔绚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酈道元，字善长，范阳人。青州刺史酈范之子。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为治书侍御史。作者依其亲身经历，对故都平城的历史地理、山川水系、城郭宫殿、苑囿寺观等作了生动的描述，是平城全盛时期的真实写照。由于年代久远长期辗转传抄以及历来各家对文字纷繁的注解，不仅《水经注》关于如浑水的这一部分文字，

今天读起来十分费解，而且多年来平城范围虽曾发现不少遗存，除方山永固陵和云冈石窟外，文献与地面的遗迹一直难以对应，致使平城遗址考古一直没能有大的突破。

1995年5月，大同城南近郊发现北魏明堂遗址，同年对西侧夯土台基进行了发掘，1996年对南侧夯土台基进行了部分发掘。酈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对平城明堂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钻探和发掘结果证实，直径达290米的环形水道内侧共有5座夯土台基建筑，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规模最大，见方达42米，四周临水处，东、南、西、北分别为4座凸字形夯土台基。此中心建筑即为明堂所在，其上层应该是灵台，周围的环形水道则为辟雍。明堂遗址的发现使其成为《水经注》所记诸多平城建筑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准确的坐标点，对于北魏平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同明代府城北4.5公里有一道东西向的夯土墙，东起马铺山(古白登山)西坡，经马家小村南、过御河(古如浑水)、安家小村南，直抵雷公山西麓的上皇庄，全长约9公里，最宽处6米多，最高4~5米。夯土墙的北侧都有沟堑，御河西段的沟堑受洪水冲刷变得更宽一些。夯土采用深、浅土掺合夯筑而成，土质较细，夯层厚7~15厘米。1993年山西省考古所在此南侧进行勘探，试图寻找与之相连并向南延伸的夯土墙，结果没有发现相关遗迹，证实该墙不是平城的北郭墙，而是一道独立的夯土墙。其夯筑技术与北魏明堂遗址夯筑方法相近，代表了同时期的技术

水平和要求,因此时代也应相近。去年进行的平城考古调查,发现该墙体确实有二次夯筑的遗迹,与《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399年)二月“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太宗纪》:泰常六年(421年)三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的记载相吻合。

北魏迁都平城初期便在城北御河谷地设立鹿苑,按《魏书·高车传》记载:“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后又将鹿苑分为西苑、北苑、东苑几部分,修建离宫别馆。北苑墙不仅起到一般性的界隔作用,防范了野兽的出没和百姓的出入,而且通过后来的增筑,墙体变得宽厚、结实,两端与东西山相接,形成城北河谷地带的一道屏障,同时具备了一定的军事防御功能。《水经注·灋水》对平城北苑景物作了精彩的描述:“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迳虎圈东,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因此,大沙沟南遗存的夯土墙,西抵雷公山麓,东达马铺山西坡,延续近二十里,无疑是北魏平城的鹿苑墙或北苑墙,平城遗址便在该墙的南面。

另一处公认的北魏遗址位于大同古城村西南,御河东岸的坡缘上,为一处孤立的庞大夯土台基,村民称之为“二侯疙瘩”,西濒临御河,显得格外高耸。基址由厚8厘米左右的夯土筑成,前些年这里发现了典型的北魏时期的覆盆柱础和水波纹、联珠纹陶片。按《水经注·灋水》的描述:“(如浑)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兼诸岳庙碑,亦多所署立。其庙阶三成,四周栏槛,上阶之上,以木为圆基,令相互枝梧,以板砌其上,栏陛承阿,上圆制如明堂,而砖室四户,室内有神坐,左右列玉磬,皇舆亲降,受策灵坛,号曰天师。”而《魏书·释老志》载:“始光初,……及蒿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可见,该建筑基址并非大道坛庙。

《水经注·灋水》又云:“(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闾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缘瓦梁栋,台壁椳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建造者钳耳庆时极具建筑才能,设计监造了永固陵、太极殿和云冈石窟的部分工程建设,名

气很大,因有宠于冯太后,封宕昌公,后从例降为宕昌侯,迁洛后改姓王名遇。祇洹舍为供僧俗居住的佛寺,建筑形制可观,富丽堂皇,时人可能习惯以建造者的姓氏和封爵来称呼这座京城颇负盛名的建筑为钳耳侯精舍或耳侯佛寺,后来建筑倒塌,保存了高大的建筑基址,同时也留下钳耳侯疙瘩或耳侯疙瘩的称号。从“二侯疙瘩”的地理位置看,与《水经注·灋水》“东郭外”、“东皋”的记载相符,这里可以作为平城东边的一个基点。

2003年3月,操场城内四中以北基建施工中,挖出北魏遗物,发掘证实是一处北魏大型建筑遗址,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命名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据简报,遗址出土的“大代万岁”和“皇□□万岁”两种文字瓦当,以往在北魏永固陵、明堂遗址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均未发现,就文字内涵,这些瓦当不应是贵族豪宅、官署衙门所用之物,这些特殊瓦当与大型板瓦和筒瓦同在这样大型的建筑遗址出现,显示出原建筑品级很高,皇室气息浓厚。从其建筑形制考虑,该建筑台基面积如此之大,前有两道踏道,后有一条踏道,东沿也残存一条踏道痕迹,与其他地方发掘过的历代遗址相比,可以肯定该遗址为一处北魏皇家建筑遗址。此外,由于该遗址处于平城北部,与史书记载的宫城位置大致吻合,因此,初步推断该遗址可能为一处北魏宫殿建筑遗址。

按《南齐书·魏虏传》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魏书·世祖纪》记载:“(延和)三年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该宫殿建筑基址位于操场城的中部,从位置看,属于平城宫城内西宫东部的一组宫殿建筑基址。根据《水经注·灋水》的描述:“太和十六年,破太华、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东堂东接太和殿,……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子宫,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该宫殿建筑基址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2004年8月,以此为契机全面启动了平城考古工作,随后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明府城四面墙体的内侧残存有薄厚不等,能够形成较为完整城圈的早期夯筑墙体,外面包筑有后来的筑物,最外面包筑是明代大同府墙体;北面操场城的东墙、北墙和西墙,内侧虽然断断续续,但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早期城

垣,外侧倾斜叠压的是后来增筑的墙体,最外边包括南墙是明代的城墙。按《水经注·灞水》记载:“(如浑西水)又迺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所城也。……其水又南,屈迺平城县故城南。……魏天兴元年,迁都于此。”“(如浑东水)南迺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其水又南迺平城县故城东,司州代尹治。”参考文献资料,历史上在大同进行大规模筑城的活动有三次,分别为汉代、北魏和明代,按照相关位置、布局和规模初步分析:明府城

应是北魏平城内城的所在,北面的操场城应是汉代的平城县城,同时也是北魏平城宫城的城垣遗迹。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平城遗址具体位置不明、整体面貌不清的实际问题,必须结合《水经注》等历史文献记载,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并做详细的解剖清理,寻找可定性的实物资料,为最终确认北魏平城具体位置提供科学的依据。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上接 19 页)

严寺的薄伽教藏殿是华严寺的藏经之所,辽代度藏有著名的契丹藏,保大之乱后,经藏大多失落,金代慈慧大师集诸徒众经过三年的努力,“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诠题,后先如一”^[12]契丹藏补葺完备。元代,华严寺《藏教》再遭零落,慧明法师携其徒“或写或补,并令周足”(见元碑)。这仍是一次以契丹藏为蓝本的修定,其时薄伽教藏殿的壁藏里依然藏有完整的藏经。这是继金碑之后对契丹藏的又一次记述,之后,明清对华严寺也有不同规模的维修,但碑记里再没有提到藏经问题,契丹藏失落于何时也无从得知,现在的薄伽教藏殿内仅藏有零散的《永乐藏》、《万历藏》等。

元碑是目前研究华严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它涵盖的信息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述之外,从碑阴内容我们还可以知道元代的大同佛教寺院仍旧很多,仅灵丘县就有大云寺、孤山寺、邓峰寺、漩峪寺等。另外对于清雍正乾隆间御刻的大藏经人们习称龙藏,但元碑有慧明法师“阅龙藏一终”的叙述,元代共雕刻汉文《大藏经》三部,包括《普宁藏》、《弘法藏》、《元官藏》,但均晚于至元十年,这里龙藏不知何指,有待于新的研究和探讨。

[1] 见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 334 页:道者山,在河北昌黎。民国《昌黎县志》卷二,“道者山,县西北二十里,其上旧有道者寺故名。山麓有云峰寺”。

[2] 清释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一。

[3]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至元二十三年乙酉,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辨伪录五卷。

[4] 见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 322 页。

[5] [6] [7]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8] 《佛日圆明海云祐圣国师舍利宝塔记》,见张焯《云冈编年史》。

[9] 关于《佛日圆明海云祐圣国师舍利宝塔记》,张焯先生在《云冈编年史》一书中有详细考证,此塔 1983 年拆南城时挖出,后移至善化寺。

[10] 见《曲回寺碑记》,现存曲回寺内。

[11] [12] 见《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现存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